

全体所主张，解除奉天军武装和张作霖下野的方案，且得到村冈司令官和斋藤参谋长以下许多幕僚默认这个结论来看的话，炸死张作霖可以说是整个关东军所搞的。反之，以田中首相为首的阁员们，甚至于里头可能有赞成关东军的分子参谋本部，他们虽然都虎视眈眈着侵略中国的机会，但却都不能苟同关东军炸死张作霖的行为。

（摘自《我杀死了张作霖》一书）

我杀死了张作霖

河本大作

编者按：河本大作系侵华急先锋，文中鼓吹颠倒黑白的“侵略有理、侵略有功”的强盗逻辑。但也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及阴谋，可供读者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罪恶行径。

1926年3月，我从小仓联队中佐队附，接任关东军黑田高级参谋的工作。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是白川义则少将，参谋长系河田明治少将，后为中国通的斋藤少将。

可是，来到好久没来的东北以后，我却不禁大为惊愕。张作霖神气得很，同时因为二十一条问题，整个东北充满着排日的气氛。

对于满铁，他们计划许多铁路，与之竞争，意图压迫。在中日、俄日战争用血换来的满洲，竟面临奉天军阀任意蹂躏。

翌年，即1927年7月，田中义一以总理大臣兼任外务大臣

在朝，主张所谓“东方会议”；外务政务次官是已故森恪。

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已由白川上将变成武藤信义中将，武藤是于1926年7月上任的。他是个俄国通，曾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因此对中国也很了解。所谓中国通也有几种，有的只是住在中国，跟中国人来往，买些古董而沾沾自喜，但武藤将军不是这种中国通。

所以，他就任关东军司令以后，对于幕僚们的献策，都能懂得，上下都能够毫无保留地对经营大陆的根本对策交换意见。

随即召开东方会议。武藤司令官决定出席这次会议，我随从他到了东京。

在这个会议上，当然讨论了对满洲的对策，我力主对于奉天军阀所采取包围满铁线的态势，已非外交抗议等所能奏效；这时武藤将军强调用武力来解决。田中首相也谅解了这个主张，于是在大体上决定了以武力解决的方针。

因此，我建议利用如下的情势。此时崛起华南的蒋介石已经开始北伐（原文说蒋公与国父一起北伐，当然这是错误的——译者），奉天派的前锋已进至江浙方面的上海，以张学良、杨宇霆为主将，与之抗衡。

蒋介石以军校训练的精兵，与奉天老军阀的士卒，其实力、纪律自然有天渊之别。尤其是江浙一向是南方派的地盘。张作霖虽然乘势插足上海，但遭到蒋介石的北伐军，奉天军一定非逃回关外不可。

跟螃蟹钻进洞里一样，只要钻进去，便很不容易进攻，张作霖败退回到关外，也就安全。在这里等待，等到天气转好，他便要东山再起。

到北京自称大元帅的张作霖，拥有30万大军，现在关内。这30万军队，如果打败仗逃回关外，很可能乱来。而如果帮助他

们，这些人又没有终生感恩的节义；郭松龄事件已经考验过这班人马。

其次，南北兵戈相见，使山东和华东之地蒙受战祸，无论对具有许多权益的日本和列国，都不能等闲视之。因此必须阻止北伐于华北。

与此同时，败退的30万张作霖部队，应该在山海关解除其武装后，才准许其入关；并乘张作霖手无一兵时，一下子与其解决逐渐失去之上千件的日本权益问题。

二

蒋介石的北伐开始了。起初蒋介石接受了要避免山东、华北卷入战祸的提案，可是醉于胜利的他，竟违约进城，所以于1928年发生济南事件，由之日本遂出兵。在另一方面，如所意料，奉天军打了败仗，成群地往山海关逃。（编按：此段史实错误。）

为了维持治安，关东军即时从朝鲜编组一个混成旅团，集结奉天待命，惟到锦州和山海关，系属于满铁线附属地以外的出兵，非有奉敕命令，不得出动。可是奉敕命令一直没下来，败兵却接踵而至。

当时的首相，又是东方会议的主持者田中，对于东方会议的决议，在山海关应该采取的方针，不知为何却犹豫不前。

这是由于出渊驻美大使的报告，顾虑美国的舆论，而踌躇实行既定方针的结果。

那时的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是松井石根中将，加以田中首相的亲信佐藤安之助少将等的影响，田中的想法更由之摇摆不定。

这时，关东军司令官已由武藤将军换为村冈将军，在人格、见识上村冈将军并不逊于武藤将军，并且在经营大陆的意见上，

两人更是完全一致。因此，关东军的态度也就毫无所动。

但最重要的中央，却是这个样子，真是糟糕。不久，在奉天城内，吴俊升由黑龙江省率领5万军队，出来守着。加以从出海关天天要回来一万、五千不等的败兵。所以迨至5月下旬，入关的败兵已经达到三四万人。败兵更经由京奉线和古北口而来。

如此这般，一旦有事，关东军势必陷于四面楚歌之中。奉天还好，弥漫整个东北的排日，一发生事情，势将有如燎原之火；排日军，很可能统统揭竿而起。我认为，只要打倒张作霖一个人，所谓奉天派的诸将，便会四散。今日人们之以为只要由张作霖统治满洲，就可以维持其治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张作霖毕竟是个军阀之流，眼中既没有国家，更没有群众的福利。至于其他诸将，只是头子、喽罗的关系所结合的私党。

正因为他们的结合是这样，所以只要把这个头子干掉，他们便会四分五裂，而在还没有出现第二个张作霖以前，他们是不知所措的。是即张作霖的存在，跟匪贼的头子并没有什么两样。

干掉头子。除此而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路。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

村冈将军也终于得出这个结论。但要杀张作霖，并不必动用在满的日军兵力。用谋略应该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这时张作霖还在华北，慢吞吞地在准备逃离。于是有人认为，借华北日军之手，便能够轻而易举地干掉他。因而决定派遣竹下（义晴）参谋为密使，前往华北。

得知内情的我，遂对竹下参谋说：“不要多此一举，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华北方面有没有敢干这种事的人，实在心存疑虑。万一的时候，不要给军方或国家负任何责任，而由一个人去负一切责任，否则虎视眈眈的列国，一定会乘这个求之不得的机

会来胡搞。所以由我来干好了。因此你到华北以后，直往北京，仔细侦察张作霖的行动，确知他何月何日坐火车逃到关外，随时告诉我。”当时，北京大使馆副武官是建川（美次）少将。

三

没多久，竹下参谋便来了密电。他说，张作霖已经决定要逃往关外，回到奉天，并告诉我火车的预定行程。因此，我便派出侦察者到山海关、锦州和新民府等京奉线的要地，令他们确确实实地监视各通过地点，并即时告诉我，火车是否已经通过。

至于在奉天，哪个地点最适当，经过一再研究的结果，认为大河上的铁桥是最好的地点。

于是遂令某工兵中队长，详详细细地侦察其附近的情况，结果发现奉天军的警备严得不得了。而且，最低限度，得在那里等上一个星期左右。在这样警备森严的状况之下，这是办不到的。尤其是据说张作霖惯用善身者，所以要一次就把他干掉，实在很不容易，需要非常充分的准备。

所以，必须另外选择日军监视比较自由的地点。经过多方研究以后，得出满铁线和京奉线的交叉地点皇姑屯最为安全的结论，因为在这里满铁线走其上面，京奉线通过它的下面，日本人在那里稍微走动也不怎么奇怪。

下来就是要用什么方法的问题。

袭击火车？还是用炸药炸毁火车？只有这两种方法。如果用第一个方法，马上知道是日军干的。如果使用第二个方法，或能不留痕迹地达成目的。

因而我们选择了第二个方法。但为预防爆炸失败，我们准备了第二套计划，即令火车出轨翻车的计划。这时，将乘其混

乱，使刺刀队冲上去杀。我们的一切准备都完成了。

根据第一手情报，6月1日不会来，2日、3日也没有动静。迨至4号，来了张作霖确坐上火车的情报。

通过交叉地点将是早晨6点钟左右，我们遂装上第一道和第二道爆炸装置，以便防止爆炸的失败。但要在当场炸死张作霖，则需要很多的炸药，如果炸药量少，很可能达不到目的；如果多，效果当然较大，但会闹得很大，真是头痛。

与此同时，我们又担心在这个时间满铁线的火车开过来。当然最好是事先告诉满铁，但这是属于绝对的机密，所以又不便这样做。因此，为了发生万一的时候，遂装设发电信号，以防止满铁线的危害。

毫不知情的张作霖的专车，终于开到交叉地点来了。在轰隆的炸声同时，黑烟飞扬200米上空。我以为张作霖的骨头也飞上天空了，其黑烟和炸声的厉害，使我惊奇不已。

由之，第二道的出轨计划和刺刀队现在都用不着了。惟万一如果对方知道这个爆炸是日军所计划的，并派兵来的话，我们决定不使用日军，而将由荒木五郎指挥其所组之奉天军中的“模范队”来对付；在另一方面，安定城内，有关东军司令部的主力来警备。

如果奉天军动用兵力的话，张景惠将内应日军，另起独立之奉天军，发动如日后的“九·一八”事变。但因奉天派有聪明的臧式毅，阻止了不能自制的奉天军的行动，使奉天军与日军的冲突防范于未然。

为了镇静人心，没发丧，而只发表张作霖负重伤，没有生命危险，因此奉天城内非常安静。这时候，排日行为停止了一段时间。

四

张作霖被炸死以后，张学良和杨宇霆这班人猜不透在奉天之日军的意向，因而留在锦州方面，不回奉天，在那里观望，所以奉天遂以袁金铠为首长，组织东三省治安维持会，做为临时政权。

而在日本方面，对于今后东三省政权的首脑应该推举谁的问题，有各种意见，奉天军事顾问松井七夫少将一派拥护杨宇霆，当时的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少将一派则支持张学良，两派互相暗斗。

但秦和松井认为令奉天政局呈现真空状态实在不适宜，因此他俩遂向张学良表示没有他意并怂恿张、杨回奉天，所以张学良才放心，化装成工人回到奉天来。

正在此时，前驻华公使林权助来奉天，与心神还不宁静的张学良会面。

林权助对张学良讲述了日本外史中“关原战役”后，丰臣与德川的关系的一段，暗地里把张学良当做丰臣秀赖，比拟杨宇霆为德川家康，以鼓励张学良。

比照大阪城沦陷后丰臣秀赖的命运，张学良对说不定会变成德川家康的杨宇霆，经常疑神疑鬼。这时，杨宇霆举办了祝寿宴，张学良也列席了这个盛宴，更有从全国各省来的许多要人赠送贵重礼物，这使张学良觉得天下的诸侯在丰臣秀吉去世后，已经倾向德川家康了。

至此，张学良对杨宇霆的猜疑愈来愈深，从而怀有要将其杀害之意。于是张作霖被炸死翌年4月间，张学良便把杨宇霆请来奉天督军公署，并令事先安排好卫兵长等人，用手枪当场将杨宇霆打死。

得悉这个消息的秦少将，和身居奉天军的黄慕（荒木五郎），遂抓住这个机会，拥护张学良为东三省的新主人，策划张学良走向亲日。可是，当时在张学良身边的年轻亲信们，却都醉心于欧美，崇奉自由主义，因此张学良的恐日，遂逐渐变成排日，而终于成为侮日。

具体表现，就是满铁线的包围铁路、万宝山事件，和冯庸大学的排日教育。排日和抗日，甚至比张作霖时代更为积极，而且日趋激烈，秦少将等人所意图的张学良怀柔方策，由之完全归于画饼。

如此一来，枭雄张作霖死亡后变成张学良时代，但满洲的对日关系不但没有好转，反倒背道而驰，所以我觉悟：除非再用武力打倒张学良政权，满洲问题将永远不能解决。

反此，日本政界欠缺要解决满蒙问题的诚意，对于张作霖被炸死事件不仅没有妥善处理，并且更有人把它当做倒阁的工具，譬如中野正刚、伊泽修二等就是这类人。

当时的陆相是白川义则上将，他很愚直，对事件不会答辩，因此更予中野、伊泽等以可乘机会，而终于导致田中内阁的垮台。

由于参加这个事件，我受到停职处分，村冈军司令官、斋藤参谋长和水町竹三独立守备队司令官也分别遭受行政处分。

政争终于误国策。政党政治之弊端，至此达到极点，为日本宪政史上留下最好的例子。

因此我于1929年5月，被滴降为第九师团司令部附，同年8月，因受到停职处分而脱离军职。尔后，依以前伏见联队时代的关系，暂居京都伏见深草愿成，表示禁闭之意。

五

在这禁闭生活之中，我充分把握默思的时间。社会滔滔走向自由主义，他们大肆抨击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有的外交官，甚至主张放弃满洲和蒙古。

年年在增加的日本人口，应该怎么办？粮食的对策呢？现在应该重新检讨由这些问题而产生的经济政策才对。其当然的解决方策，实舍对大陆坚定的方策莫属。而我所采取的武力方法，是不是应该受到人们的攻击？如果应该反省，我将反省。

我为了自责和自省，以及虚怀若谷地把握时代，我曾努力于研究。我又请教过京都帝大的许多权威学者，而且连日前往京都帝大的图书馆，广览有关政治经济的群书。

结果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的将来，实惟赖满蒙问题的解决。我更坚信：日本应该以新的构想，来解决满洲的问题。

我谪居伏见一年以后，又恢复军职，并任第十六师团司令部附，但翌日，即被编入预备役。由于禁闭生活已告一个段落，所以遂移住东京。

（摘自《我杀死了张作霖》一书）

“南方革命军便衣队”之谜

户川猪佐夫*

为了暗杀张作霖，河本做了很巧妙的导演。他驢名叫安达

* 作者为日本政论家。